

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

#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Zhong Guo Jin Dai Xue Shu Ming Zhu*



##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

陈 澧 著  
杨志刚 编校

中西書局

#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

##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

陈 澧 著

杨志刚 编校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 / 陈澧著；杨志刚编校. —  
上海：中西书局，2012.6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 钱锺书主编 朱维铮执行主编)  
ISBN 978-7-5475-0287-7

I. ①东… II. ①陈… ②杨… III. ①政治思想史—  
中国—近代 IV. ①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5317 号

---

---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

陈 澧 著 杨志刚 编校

---

责任编辑 秦志华 张 荣 路征远

特约编审 李国平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287-7/D·010

定 价 32.00 元

---

# 重版前言

朱维铮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册，于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为繁体字直排本。现在重版，改由上海中西书局刊行简体字横排本。\*

当年由我撰写的初版编者说明，关于编纂过程，交代如下：“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过程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凡十年，其中必有曲折。我的陈述没有虚语，但说得太简单，刊出后未免引出猜测和议论。

起初有种议论，以为钱锺书先生不可能同意任丛书主编。事实呢？一九八八年早春，我应邀赴北美两所大学承乏客座教席，途经香港，与正在振兴香港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业务的董秀玉总经理兼总编辑，商讨她年前的一个提议，要我主编一套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名著的丛书。她同意我用五年编成晚清编三十种的设想，随即由我以主编身份，与香港三联签订了出版第一辑十种的合同。这时董总又提出，为利于丛书在两岸三地发行，可请钱锺书先生出任丛书顾问。

没想到不久董总即告知，她专程赴京，将我起草的晚清编计划面请钱先生审阅，钱先生很感兴趣，并当场删去原拟选陈炽《庸书》一种。

我和钱先生素昧平生，此前在复旦大学曾两度受命筹办中国文化的

学术研讨会,均委托友人代邀钱先生出席,他均未莅临,而我仍将所编《中国文化》及国际讨论会文集寄请他过目。或因此,他对我稍有了解,当董秀玉女士请他担任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顾问时,竟慨然允诺。这使我很感动,虽在海外辗转数校,仍不断以函电敦请有关专家分担首辑十种的整理校点,自己也编纂较难的几种。

事情往往出乎逆料。大概在一九八八年初冬某日,董总致电给我,说是日前钱先生对记者发表谈话,内谓他已破例同意担任香港三联将出版的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主编”。董总深感署名处理为难。我以为钱先生可能记忆偶误,却对丛书在海内外被读者接受有利;至于我的署名无所谓。问题是合同已规定主编应对编纂的稿件负责审定,并撰写每一种的学术性导言,这对年已七十八岁的钱先生可能有困难。其后商定,有关责任仍由我履行。

岂知事情的变化更出意外。我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从德国转道香港回沪,董总谓丛书校点稿排印很快,要求我即写导言,以便陆续出版。不料仅过月余,便发生那场风波,影响所及,香港三联书店也改组。新调任的总经理和总编辑,都表示承认已签合约,但对我相继交付的书稿,包括每种的学术性导言,则于收到后预付合约规定的稿酬外,便搁置不予出版,理由是香港市场小,学术性书籍卖不掉。

怎么办呢?合约未改,我仍算主编,而我在学校勉强恢复教学秩序之后,除了带研究生,便全力逐篇从事导言的撰著。董秀玉女士已回北京三联书店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她关心丛书的出版,港方却答以等我将十篇导言交齐再议。她建议我将已改定的导言,径寄钱先生审阅。我依言寄出拟列为十种首篇的《汉学师承记》导言稿,不久即得钱先生委托杨绛先生代笔的复函,大意谓收到我的“大作”,将留下“学习”云。那信息很清楚,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与丛书编纂的关系。这使我想起他为台

湾版《钱著七种》所写的前言,内将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遭遇,称作“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八版),现在是否表明他还要看一看丛书的命运呢?其时约在一九九二年夏季,钱先生已逾八十,风闻他和杨先生都身体欠安。于是我函告董总,表示不再以书稿事打搅钱先生。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一次书面通讯,当然此后也无缘识荆。

鉴于我早将十种书稿交齐,香港三联当局仍迟迟不予刊行,因而董秀玉女士遂通过购买版权,将十种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是丛书晚清编历经八年磨难,总算提上问世日程。不知董总怎样说服了钱锺书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仍署钱锺书主编,而我则署作执行主编。奇怪的还有香港三联当局,他们以高价将丛书版权售予北京三联书店,却又附带条件,须将书版交给香港三联,另换封面印港版五百部,就是他们估算的丛书在港台的销量。我对这种“生意经”感到寒心,从此不敢和这班人打交道。

丛书出版后,有位“钱学家”写信命我提供与钱先生的交往情形。我如实答以没有直接交往。岂知此君即作长文痛骂我学识浅陋,所编丛书十种均为劣质品云云。我不得不作文说明丛书编纂实相,建议这位图书馆学者,最好不凭臆测追究他人动机。此后被人称作专写“容安馆毁人录”的这位作者,便视我为仇敌,在所谓揭秘的“大字报”中,会莫名其妙地扯上我,骂我将丛书编坏了,却又不说坏在何处,可谓深悉诬人三昧。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初版三千五百套,早已售罄。十多年来,多有朋友建议重印。钱锺书先生早已逝世。董秀玉女士也已退休多年。我于近年身罹沉疴,于是同意上海中西书局,接受李国平先生的建议,用简体字横排重版印行。

重版必须重校。好在当年参与整理点校的诸位学者,如今均成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都为承担的成书的重校尽力。李国平先生还关注重版本的编辑发行。当初我撰写的十篇导言,出版后曾得读者商榷,现在除叙事数处略有修正外,余均依旧,至盼读者继续指正。

重排本署名,均依初版,以保存那段曲折历史。当然,仍须申明,全书由我设计体例,选定版本,通审校点,撰写导言,如有讹误不当,均应由我负责。

2011年11月28日三改

---

\* 其中《廬书(初刻本 重订本)》、《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为繁体字横排本。

## 编者说明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晚清编,主要辑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以期展现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异过程。

遴选的学者和论著,着眼于学说有新意,有己见,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领域,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

结集则不拘一格,以专题为主,每种或收一人一书,或辑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

编者对每种都做以下工作:选择底本,取原校较精的刊本;异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复核引文,凡原著约引节引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均出校记;重施标点,包括分段;编制索引,分人名、书名两类。

编者对每种都撰有导言,附于篇前。导言既重可读性,以助读者了解相关专题的历史实相;也重学术性,当然属于导言作者的一得之见。为行文简明,诸导言凡引证出处、考订史实或商榷疑义,均以附注形式陈述。

限于编校出版的条件,晚清编拟分辑刊行,初定每辑十种,先成先印。如可按设想出齐,当能略见系统性。

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倡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全编原定由两岸三地同时出版,因而版式定为繁体字直排。第一辑早已编成发排,由于种种缘故,长期不克面世。现由北京生活·读书·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

新知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推出。

编者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处参预编纂的年轻同仁,感谢三联书店辛勤校勘的诸位编辑,同时期待高明指正。

## 编例

一、本丛书选辑十九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学说名著,每种均由编者予以校勘整理:

底本。以原刊为主,有不同版本者择善而从。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误,兼正原作者明显笔误,并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据正误。一般不作理校。除对校诸本择善而从者外,凡校勘改动处均出校记,以顶注形式见于同页。他校所得亦以校记出之,于正文不作改动。

节录。于篇题下注明,并于篇末注明节录出处。

标点。原刊本无标点或仅有旧式断句者,概施以新式标点。

分段。文言文论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读者。

注释。作者原注概从原刊。编者增注限于指出原著有关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显讹误,以顶注出之。

译名。中文译名及译文概从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并有讹误,则由编者径予改正。为方便阅读,若干种书末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新译名均依中国大陆出版物的通行译名。

版式。概用繁体字,直排式。除涉及语言文字学说外,凡原刊古体字异体字,均改为通行繁体字。原作或有双行夹注,现均改为单行夹注。

索引。所选诸种均增编人名、书名两种索引,以便通检。

二、本丛书所选诸种,专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参考价值者,予以保留,并移作附录。每种前均冠以导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 导言

朱维铮

## 一

以粤海地区为重心的岭南学术,在明代曾走向繁荣,出过王学的先驱陈献章,出过同王守仁抗衡的湛若水。自利玛窦于一五八〇年进入广东,这里又成为同近世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地区。但十七世纪后期清帝国经过反复征服终于控制整个岭南以后,这里的学术文化,非但没有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而恢复元气,相反似乎每下愈况。康熙末年,经学家惠士奇任广东学政,甚至寻访不到可充乡土楷模的“能文”之士<sup>[1]</sup>。直到号称学术繁荣的乾嘉时代末期,情形并无改变。

原因仍待研究,但主因显然不在于缺乏财富。正好相反,由十六世纪初期起,广州港便一直是明、清帝国同近世欧洲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门户,有时还是唯一门户。欧洲殖民者从新大陆和东南亚掠夺的大量白银,通过这个门户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以换取越过五岭运往广州的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和药材。这使粤海地区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贫银的中国的历届帝国政府,得以依赖“外汇”长期支持货币流通的银本位制的要枢。这由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早已获得证实。不待说,广东也在经济上获益。

问题是财富落入谁手?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固然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帝国政府的通商垄断,则使中外贸易主要变成内库的财

源,地方官吏、行商等特权者的利藪。因此不难理解,主持广东军民政务的总督、巡抚,在雍正、乾隆到嘉庆三朝,罕由非旗籍官员充当,而粤海关监督一职,在整个清代几成八旗子弟的禁脔。百年间这里的督抚很少不享有贪墨名声。偶有号称能员的人物,关心的也只是对内强化地方治安,对外强化华洋隔离。<sup>[2]</sup>于是也不难理解,这个地区虽已“太平”百余年,而“文治”依然落后如故。

岭南学术重有起色,转换点应说是阮元督粤。阮元是扬州学派学者,但官运亨通,以翰林起家,屡任学政、巡抚、总督,五十三岁调两广总督,一任九年,其间六署巡抚。他的政见未必高明,但异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在广州创办学海堂,编刻《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重修《广东通志》等,对于晚清的岭南学术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注意选拔本地人才,学海堂初期聘用的学长曾钊、林伯桐等,都是他访知的地方学者。后以编校《粤雅堂丛书》等知名的谭莹,也是他亲自从童生中发现的学者。<sup>[3]</sup>而出资精刻这些学术巨帙的是著名行商伍崇曜,也可见阮元的提倡风雅如何打动富商把眼光投向文化事业。扬州学派原已出现经史诸子并重和兼容异说的取向,阮元又特别提倡消除门户之见,而且注意西学入华史。这也给岭南学人留下深刻印象。

岭南学术稍成气候,已在鸦片战争以后。有“会通”特色的代表人物,一是朱次琦,一是陈澧。他们都主张调和汉宋,都提倡“古之实学”,都以讲学来传播自己的见解,并都在一八八二年同受清帝的特旨表彰<sup>[4]</sup>。但朱次琦更倾向理学,把修身看作学生的第一要求,而且憎恶清代汉学胜于憎恶明代王学,敌视“洋务”一如敌视“贼民”,留下的论著也少。<sup>[5]</sup>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陈澧在晚清实属使岭南学术具有较大影响的首出人物,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尤值得注意。

## 二

一八七一年即清同治十年,六十二岁的陈澧,写过一篇《自述》,说是“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sup>[6]</sup>。这篇自传,以后被几种有关陈澧的传记所取材<sup>[7]</sup>。不妨据此对他略作介绍。

陈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字兰甫,广东番禺(今广州)人。他自幼习举业,十七岁即获得县学生员资格。此后几年颇为得意,先被学政翁心存赏识,以廪生入粤秀书院肄业;读了三年便题了优贡,由三年任满的学政与总督、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次年(一八三二)又中道光壬辰科乡试举人。因此他于二十四岁入都参加会试,省城舆论看好,以为他此行大有中鼎甲而点翰林的希望。岂知出了省境就交了歹运,十三年间考了五次,无不名落孙山外。不得已向吏部报名参加六年一轮的举人“大挑”,机会是十取其五,满以为可选得县令,不想又考在二等,只能做教官。他安慰自己,“以为不能治民,犹可以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士习而起者”<sup>[8]</sup>。可是等到一八四九年实授本省河源县学训导,到任便发现“乱”的不是士而是民,“盗贼遍地”;仅两个月就请病假回家。幸亏跑得早,不然就像河源县令一样,“为贼捉去矣”<sup>[9]</sup>。不过他还想一试,因为这一年道光帝死了,咸丰帝继位,照例要在改元之初开恩科。于是他又北上会试,想不到又落第。举人经六次会试不中,便可循年资补选知县。他在一八五六年捱上了,但世道更乱了。太平军还在长江中下游同清军鏖战。南海上空又战云密布,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从广州开衅。“若当此时而出,则宜有戡乱之才;且有其才,尤当有其权。”<sup>[10]</sup>谁都知道乱世的亲民官难当。这时陈澧更担忧被狡诈的上司驱策,陷入民人洋人冲突的夹缝中被挤扁。于是只

好放弃追求了二十来年的“百里侯”，申请改授京官。于是被授国子监学录<sup>[11]</sup>，一个正八品的最冷小官职，相当于后来国立大学的系主任助理一类脚色。除帽顶由银色改金色，公服由青绸改青缎，并在胸前背后加了两块绣有鹌鹑的补子，同举人没有更多区别。

还在一八四〇年，陈澧已受聘担任学海堂学长，即后来的班主任。出仕无望后，他又在这里执教十年。直到一八六七年出任新办的菊坡精舍山长，即校长，直到七十三岁去世。他前后在广州的这两所旧式高等学府，任教共四十二年。教出的学生不少。在政坛上知名的，例如戊戌维新期间“帝党”名角文廷式，是他的菊坡精舍弟子；清末立宪运动期间首唱“十年预备”方合国情而受舆论唾骂的于式枚，也是他在菊坡精舍的弟子。<sup>[12]</sup>

学海堂和菊坡精舍，都是以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为模式的。“以古学造士”<sup>[13]</sup>，课程以经学为主，兼及史学、诸子学。“小学”（音韵、文字学）是入门功夫，明地理、知历算被看作解经研史的必要手段。教师讲授以外，有师生问答，有命题和选题的习作即“课艺文”，优秀习作连同教师的范文一起结集刊印。砥砺品格仍被视作首要的，但更多要求自觉用共同尺度约束行为，而不仅单靠外在的强制。因此，这样的教育方式，更其是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当然不是近代化的，而是“复古”。但相对于当时的官学私塾的教育来说，这种复古，正是对于讲书“但为作时文计”的恶劣风气的否定和突破。晚清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超越中世纪后期统治学术传统的著名学者，多由这类学府出身，不是偶然的。

所谓败军之将更善于学习，未必尽然，但对于陈澧来说，这倒是恰当的形容。他在会试场上六战六败，耗去了从青年到壮年的人生最好年华，兼以目睹耳闻，使他对科举制度本身由怀疑到否定。“天下人才败

坏,大半由于举业”<sup>[14]</sup>;“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sup>[15]</sup>。诸如此类抒发愤懑的言论,屡见于他的文字。

因此,当陈澧决定退出功名角逐,转而从事于人才教育,那时他把目标定为使后进不再重蹈覆辙,便不言而喻。但他在公开议论中,还不敢鼓吹取消举业,只敢要求“废时文”,甚至只敢要求先改变“割裂经书”的命题方式,因为他害怕冒犯已靠想靠八股晋身的官僚士人的利益。“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sup>[16]</sup>——这不禁令人想到日后康有为力陈变法“不可躐等”的灵感由来。

既然连变革科举旧法也要“渐行”,那就可以理解,陈澧分明志在用世,“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分明不以在学校授课训徒的有限效应而满足,决定上追他最服膺的顾炎武,写一部堪与《日知录》比拟的巨著。但他又表白此书与《日知录》不同,既不想记博闻,也不敢谈治法,“但论学术而已”。理由其实在他的私信中也说了:“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也。”<sup>[17]</sup>可见他的自负决不亚于顾炎武。因为这段自白,令人立即想起顾炎武对《日知录》未来效应的自我预测,所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之隆”<sup>[18]</sup>。

本来,两个世纪的清学史,已经证明顾炎武的预测错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论“治道”的中篇,但恰好这一部分,在后世受到最大冷遇,倒是他在上篇“经术”中所显示的经史研究方法,却受到十八世纪的汉学家们异乎寻常的崇拜。原因不尽在于学者们害怕多疑的清帝国统治者找到文字狱的打击对象。原因还在于中世纪历史早已昭示,没有任何政府曾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正如黑格尔所说,“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

由”<sup>[19]</sup>。陈澧欲希踪顾炎武,写一部给未来从政者据以“变法”的教科书,却避开关于政治弊病的直接批评,而用学术明则人才出、人才出则政治清的逻辑,来替自己既想出头又怕受咎的心态辩护,正好表明他没有从顾炎武的失败中间学到什么。

不过也需指出,陈澧寄希望的来者,不是顾炎武寄希望的“王者”。他屡次强调,未来的希望在下而不在上,在士而不在官。他一再宣称,只要年青学人实现顾炎武申述过的孔子二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sup>[20]</sup>,那么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将胜于“俗士之居大官者”<sup>[21]</sup>。历史证明这同样是幻想,但把幻想改变现状的力量,由个别帝王而移向“读书明理”的群体,在那个时代便不能不说是较为高明的幻想。

表现陈澧这种矛盾见解的论学术著作,便是他没有写完的《东塾读书记》。

### 三

《东塾读书记》,书名原拟为《学思录》<sup>[22]</sup>。不待说,原名取自《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sup>[23]</sup>。它草创于一八五八年。可能由于这一书名的涵义,更适合于诲人而不足以自见,陈澧在一八七一年又将它改成《东塾读书记》<sup>[24]</sup>——取斋名为书名,由此人称他为“东塾先生”。

陈澧原计划写二十五卷。按照目录,一至十卷论儒家十二“经”;卷十一论“小学”,但含《尔雅》,因而这十一卷实际要论流俗所谓“十三经”的全部;卷十二论先秦两汉诸子;十三至二十四卷论西汉到“国朝”的学术,内有两卷专论郑玄和朱熹的学说;卷二十五称“通论”。以上结构,显示《东塾读书记》实分上下篇。上篇为“经学”,小学、诸子则是附论;

下篇为“经学史”，而所谓通论似为结语。

一八七五年清朝改元“光绪”。也许又值“皇上初政”，再度唤起陈澧“或可以自效”的希望的缘故<sup>[25]</sup>，他在这一年刊布了《东塾读书记》的起首两卷，即《孝经》卷和《论语》卷，就是明证。这不是我的推测。所谓十三经，序次照例先列“五经”，无论经古文学或经今文学都如此，不同的只是“五经”内在次第<sup>[26]</sup>。而以《孝经》居首，《论语》次之，则是陈澧的“发明”。卷一读《孝经》记，凡十三则，却有近一半篇幅，历引郑玄、许冲、司马光诸语，称《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合以《论语》，“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sup>[27]</sup>。此卷特引咸丰帝令各省岁科试增《孝经》论一事，赞曰“正合东汉之制”，而谁都知道四岁的新君是作为咸丰继子登极的。陈澧赶在光绪称元这年推出这两卷，不正是《东塾读书记》写作意向的直接发露么？

那以后，《东塾读书记》便不得不随年写定而分卷刊行。写作形式一如《日知录》，一条条的笔记串辑成卷，每卷多则数十条，少则十余条。每条字数也不相等，有近似论文的长篇，有好像杂感的短论，有征引颇广的考证，也有片言只语的摘录。陈澧是顾炎武的“著书不如钞书”论的信徒，认定“钞书著书合而为一”，方显作者的学问博洽程度。<sup>[28]</sup>他所谓的钞书，自然指顾炎武所说的，好比良工开山采铜而铸新钱，并非鼓吹“天下文章一大钞”——那恰如顾炎武所讥“今人纂辑之书”，非但是买旧钱当废铜以充铸，而且是把属于珍贵文物的古钱予以破坏。陈澧既然如此高自期许，因而《东塾读书记》的篇幅不算大，但到他去世前的七年里，仅刻成十五卷，共收笔记六百十一条<sup>[29]</sup>，总计只有二十万字左右。

陈澧生前没有写定的部分，占原拟卷数的三分之二，而且都属于前述的全书下篇，即由汉至清的经学史部分。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